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允起
编

萧公权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允起
编

萧公权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萧公权卷/张允起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0-19939-9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萧公权 (1897~198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774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萧公权卷
张允起 编
Xiao Gongqu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9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萧公权（1897—1981）先生原名笃平，字恭甫，自号迹园，先后用过石沔、巴人、君衡等笔名，祖籍江西泰和，1897年11月29日生于江西南安。据萧公权自传《问学谏往录》回忆，他6岁时跟随伯父移居四川西部崇庆州，开始接触《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等启蒙读物，后习《论语》、《孟子》、《国语》等典籍，兼习英文和日文，12岁时偷偷读过在父亲遗物中发现的《民报》。少年时代的萧公权师从家庭教师何笃贞，五年期间通读《十三经》，精读《纲鉴易知录》，养成博览的习惯与作文的能力。留美期间，何师还常与萧公权通信，并以“通古今，贯中西”相勉。^①1915年，萧公权从四川来到上海，成为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三年级学生。1918年8月，考入当时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成为该校高等科三年级学生。在学期间，他向《清华周刊》投稿，编辑过《民钟》日报。当时的他既反对“打倒孔家店”，也反对“全盘西化”，认为“救国必先读书”。^②1920年，24岁的萧公权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留美生涯。留美期间，他起初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在政治学者萨拜因（G. H. Sabine）教授的示意与指导下，完成了有关政治多元论的硕士论文。其后，他放弃到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萨拜因教授的推荐下，选择萨氏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师从哲学家狄理（Frank Thilly）教授，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1926年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辗转于中外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四川、光华、政治、台湾、华盛顿（西雅图）等中外大学，从事法哲学、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学科的教

^① 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3~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② 参见上书，33~39页。

学和科研工作，并留下《中国政治思想史》、《迹园文录》、《宪政与民主》、《自由的理论与实际》、*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统治》）、*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作为改革家与乌托邦主义者的康有为》）等中英文著作。此外，除了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论文及书评以外，《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可以找到萧公权撰写的条目。这些著述以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西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政治多元论与政治一元论的关系、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诸问题、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联、现代化问题、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思想等等。萧公权学术思想博厚精深，行文细密笃实，对史料的钩沉及其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是罕见的。此外，他对近代以来中外现实政治与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洞察与论述，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本卷所选萧氏论著分成五个部分：“中西政治思想”、“宪政与民主”、“政治评论”、“自由与自由社会主义”、“大学教育与学术独立”。下文依次简要介绍所选篇目背景及内容，敬请读者参考指正。



《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1932年）是萧氏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关于政治多元论问题研究的继续，可以约略了解其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之一斑。萧氏对拉斯基多元论思想的基本态度，着重于分析其思想渊源及其得失。实际上，萧氏对拉斯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共鸣之处：“吾人于赖氏学说虽有所论评，而实同情于其基本之态度。赖氏既非旧式之个人主义者，亦不采极端之社会主义。就其全部思想观之，实为一种折衷综合之新论。而其综合之原则，则为一种富有人文主义色彩之伦理观念。”^①

萧公权在其英文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中没有涉及中国问题，但

^① 萧公权：《评张士林译赖斯基〈政治典范〉》，载《天津益世报·政治副刊》，1930-05-27。

归国途中暗自确定了以后的研究计划：“我相信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用虚心的批评态度同时去检讨中西文化。……根据这认识，我立了一个志愿：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点训练，所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① 归国后，他先后在各大大学教授“政治学概论”、“社会学原理”、“比较政府”、“法理学”、“西洋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其中，“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科目。他精心准备教学，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搜集有关政治思想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历时十几年，最终撰成《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巨著，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术领域的确立。萧公权在其《中国政治思想选读》（国立清华大学讲义，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前后排印本）“凡例”中有言：“汉唐以后‘子部书’渐少，‘集部’渐多，各家政论亦渐趋重实际之问题。至于原则之研讨，有系统之理论，殆绝无而仅有。兹编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选录讨论政治原则之著作。”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凡例》（1940年）中又说：“二千余年中之政论，汗牛充栋，不可悉收。若按西洋政治思想史家之严格标准以定去取，则秦以后之著述，合格者又悉甚寡。兹编选录之标准有二：一曰尽量收录有理论价值之文献，二曰酌量收录有历史价值之文献。其纯乎针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而发之政论则不选入。”^② 他看重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政治原则”、“理论价值”部分，说明他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背景，与所谓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所谓客观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不同。作为对清末以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议论的一种独特的回应方式，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与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意图与计划之间存在连续性，其基本立场不仅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也与“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迥异。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萧氏不仅留下《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宏篇巨著，也留下本卷所收部分专题论文，从中不难发现其中西政治思想研究的问题意识。

在《中国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论》（1934年）一文中，萧氏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涉及政治起源的学说分为“天命”、“人归”、“圣立”三种。关

① 萧公权：《同学谏往录》，70页。

②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873页，商务印书馆，2011。

于“天命”说，他以儒墨诸家学说为代表，指出“神道设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并与西方“神权”说相比较。关于“人归”说，萧氏举出管子、淮南子、班固、抱朴子、柳宗元等，并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契约论相比较。萧氏举出《商君书》、《吕氏春秋》、陆贾《新语》、韩愈《原道》等著述，作为主张“圣立”说的代表，指出其本末倒置，与“民为邦本”之说的对立。萧氏认为，上述“天命”、“人归”、“圣立”三派大体以“民本君治”为主旨，为往昔的“仁惠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取阮籍、鲍敬言、无能子为例阐述道家的无治思想，并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较。萧氏此前发表的《晋代反政治之政治思想》（1932年）中已经论及“消极之无治主义”的特征及其时代背景，并且认为当时“国难”严重，“不亚晋时”，颇有借古喻今之义。

从本卷所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辑要凡例》与《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1943年）中可以了解他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大致内容。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第五编 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内含“第二十五章 孙中山（本编缺文）”。该书《凡例》交代：“本书第五编，原稿沦陷，仍存其目，以明原委。”其中原委，不宜妄断，但发表于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的《图书集刊》第四期（1943年3月出版）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四 成熟时期”专门论述孙文思想系统，其中隐约可见萧氏论断政治思想之倾向及其治学精神：“中山先生思想异乎寻常之处虽多，而其最重要之特点，似在其融通中西，调和新旧，以集成为创造之伟大能力。”又言：“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之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盖处二十世纪之时不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精通欧美之学术不足为现代之思想家。此二条件，先生皆具，而又加以慎思明辨，集成综合之创造能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至先生而始成立，固非出于偶然矣。”

关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现代意义，萧公权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诸子配孔议》（1944年）、《圣教与异端——从政治思想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1946年）、《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1949年）等文章。在《诸子配孔议》中他建议“管老墨三子设位文庙，配享孔子，与先儒先贤一体受国人的尊崇纪念”，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广包兼容的伟大系统，其中是没有门户界限的”。在《圣教与

异端》一文中萧氏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决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所能包括”。他破除儒学“独尊”的虚像，指出孔子思想的封建宗法背景，认为“应当对先民的成绩加以了解，分析，评量，抉择。评量抉择的标准，不是任何一时一代、一家一派的主观意见，而当于全体文化、全部历史中求之”。在《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萧公权详细论述了孔子“人本主义的政治观”，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从根本到枝节，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或目的。在他的学说当中，政治生活是人性的表现，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要求的努力。我们尽可套用美国故总统林肯的名言，把孔子的学说称作‘人治、人享、人有’的政治观。因为孔子的理想托基于人的本身，所以他绝无追求玄虚理想而牺牲人类实际利益的错误。在今日狂热、冷酷、横暴、险诈风气流行的世界当中，许多人早已忘记了人的尊严，甘愿把成千成万的人用作少数仇恨者或野心家的工具。我们重温孔子人本政治的妙义，仿佛听见了清晓的钟声，发人深省。假如孔子生当今世，他一定有更恳切入时的主张，以与灭绝人性的暴政相抗。”萧公权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时代性与超时代性。《诸子配孔议》、《圣教与异端》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阶段主要强调和分析的是孔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时代性。而《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则在看取孔子思想的超时代性的同时，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对 20 世纪前半期人类历史上的独裁与暴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挾伐。

二

“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三十七年当中，我发表过若干讨论政治的文字。为数不多，但涉及的范围颇广。‘立言’的宗旨在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① 萧公权认为“现代化工作的枢纽是政治的现代化”，而现代政治又至少包含两个要点：民主化与制度化。“这两点其实是一种政治的两方面：凡是真正民主化的政治必是制度化的政治。民治与法治是相依为用的。”^② 他的政论围绕着宪政与民主问题展开，以《宪政与民主》（1948 年）为题集结出版。

^①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187 页。

^② 萧公权：《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见《迹园文录》，215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萧公权有关宪政的最初政论文章是《施行宪政之准备》（1937年）一文。作为实施宪政的准备，他首先强调了事前教育与训练的重要性，其见解的透彻在同时代人当中是罕见的。与独裁国家强制灌输信仰的做法不同，萧公权强调的是理智的自由发展与思想的自由运用，认为宪政以人民的智力水平为基础，因而自由主义的教育首先应当注重训练人的理智。他继而分析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指出其在理智与感情两方面均欠训练的事实，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方针的不确定以及传统的习惯。他批判了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教育理想的不足之处，认为：“盖世不能有缺乏理智之道德，而道德实寓于大智大慧品格之中。若就‘国民道德’而言，则在宪政国家之中，除理智之人生观外，更无有较适宜于平等自由精神与乎自治会议制度之公民理想也。”有关理智的人生观与言论自由的关系，他在《说言论自由》（1940年）一文中强调培养“自由之言论”的重要性：“何为自由之言论？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在萧公权看来，“盖非言论自由无以宪政，非行宪政无以得言论自由。”宪政与言论自由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富于“理智”的“自由之言论”又是言论自由的关键。他以当时的意大利、德国以及苏维埃政权为例，揭示出其极权主义与愚民政策的本质，强调养成“自由独立之理智生活”的重要性。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以《独立评论》为中心，曾展开“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有些人鉴于民国以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现实以及欧洲各国近代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当时中国国民教育程度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为由，公开打出拥护独裁的招牌。对此，胡适与张佛泉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对独裁论进行了正面反驳。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五五宪草”，民国时期的宪政运动出现新的转机。胡适和张佛泉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各自的见解，主张国民党应该及时公开政权，尽早结束训政，引起关于宪政与训政问题的讨论。^①

张佛泉在《独立评论》第236号（1937年5月30日）上发表《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一文，指出国人对宪政的误解，逐一批判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孙文的训政论以及梁漱溟基于其乡村理论得出的

^① 此时期关于宪政问题的舆论动向可参阅荆知仁：《中国立宪史》，401~40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宪法实施尚早的结论。在张佛泉看来，宪政“应是个生活的过程，决不是个死的概念”，“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起始”，所谓训政阶段是不必要的。胡适与张佛泉的主张相呼应，在《再谈宪政》一文中重申几年前的观点，认为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训练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针对张、胡两人的见解，萧公权撰写了《宪政的条件》（1937年）一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萧公权基本上赞同张、胡两人的立场，但认为“实行宪政固然可以（并且应当）随时起始，而培养民治气质的教育也应当时刻注重”。此外，作为实施宪政的条件，除了“读书识字”这种最低限度的条件以外，他还举出两个极端重要的条件：“尊重法律的习惯”和“依法发表政见并服从多数的习惯”。为了避免被人误解，他重申自己的立场：“我对于张胡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见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它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萧公权虽然对训政论的思想背景表示理解，但明确反对实施宪政之前的所谓训政阶段，认为只有在实施宪政的过程之中才能提高国民运用宪政的能力。他认为《大学》中“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句话，可以做一切训政论的答复。

萧公权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有关民国宪政的言论，主要关心的是实施宪政的条件以及在宪政实施过程中如何提高国民行宪能力等问题。进入40年代，他继续关注中国宪政的发展进程，并作为宪政实施协进会（1943年11月成立）的会员，对有关宪政筹备事项，向政府提出建议。^①他在《宪政论》（1943年）一文中阐明欧美宪政思想的三层含义：“一曰国家当有至尊无上之基本大法以规定政府之职权。二曰人民之权利当受此大法之保障，不容任何人士或法令之侵削。三曰国家治权当以法律为最高之形式。”关于“宪政”与“民治”之关系，他认为“民治之精义在以民决政，宪政之精义在以法治国。民治为体，宪政为用。二者相辅以行而现代民主国家之实质乃具。”他还给宪政作了一个浅近的诠释：“宪，法也；政，治也；宪政者法治也。”将“法治”与“宪政”等量齐观。他在《宪政实施后之中央政制》（1944年）中多次

^①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173页；荆知仁：《中国立宪史》，433~43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重申宪政实施过程中国民守法习惯的重要性，强调公民的政治责任，并对健全的舆论、实行宪政的信心等基本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萧公权在《怎样研究宪草》（1944年）一文中强调了研究宪草对认识中国宪政的根本意义及其历史意义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分别从学理或原则、立法技术及实际效用等方面，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多角度的宪草研究。通过对宪草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国民的意见，使宪草趋于完善，还能引起国民对于宪政的兴趣，促成国民对于宪法的了解。他在成都广播电台《宪政的心理建设》讲稿（1944年5月19日）中针对当时民众对宪政的冷淡、怀疑态度以及认识上存在的模糊，认真分析其中原因。有关宪政的本质，他在《宪政二疑及其答复》（1944年）中认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习惯。前者成于法律的创造，后者成于心理的修养”，并号召知识分子应该负起宪政先锋的责任。在《英美民主政治》（1944年）一文中他强调英美国民超乎制度之外的历史及心理条件，并对民主政治的由来与特质进行了思考。他将英美一般人民具有的自尊自重的心理归之于基督教义及自由主义传统的熏陶，强调了英美人民对政治的兴趣和修养以及明确的权利观念和守法习惯。原载《观察》第一卷第七期上的《说民主》（1947年）一文指出“民主观念的歧异”和“民主问题的严重性”，试图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或“自由”与“平等”能否协调的角度澄清观念认识上的混乱。萧公权还针对钱穆发表在《思想与时代》第三期（1941年10月1日）上的《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撰写《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1945年）一文，指出其“牵强附会，名实混淆的错误”，论述中国君主政体的形成及其本质，认为“君主专制是中国微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次大战刚一结束，“联合政府”的构想便在中国浮出水面。各党派及社会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见，围绕着未来中国的宪政体制展开激烈论争。众所周知，此一时期中国的政局变动是以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阶层为中心展开的。基于1945年的国共会谈，后经各党派多次协商，1946年1月召开了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中，宪法草案组前后举行会议五次，决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协议宪草修改原则十二项。会后，宪草审议委员会参酌宪政期成会修正案、宪政实施协进会研究结果及各方意见，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①但由

^① 荆知仁：《中国立宪史》，437～445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